

全球化與社會認同

互鑄九

聯合國發展計劃 (UNDP) 出版的《1999年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的封面使人心驚。封面裏說明其外圈為世界人口，扇型派分為各區域，中央暗色楔形顯示為全球範圍內的網際網路 (互聯網，Internet) ①使用者。它顯示傳播、溝通與通信的技術整合趨勢，也形象化了全球化下的不均性，這也就是所謂不均等的資訊化發展 (uneven 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網際網路正在新的全球網絡中聯繫世人，但是通路卻集中於富裕國家的人們之間。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國家佔世界人口的19%，但卻居使用者的91%。聯合國發展計劃提醒我們：「地理障礙可能已為傳播與通信所減低，但是新的障礙已經浮現，像普及全球的資訊網，允諾連結，卻寂靜地，幾乎難以察覺地，排除了其餘的人。」

若我們進一步審視資料 (至1998年年中)，可以發現美國的人口只佔世界人口之4.7%，但是卻佔了網際網路使用人口的26.3%。整個東亞，人口佔22.2%，使用人口卻只有0.4%。再往前一步看，有些國家的使用人口比美國還高，像北歐的冰島 (接近40%)，瑞典 (30%) 與芬蘭等。在東亞，新加坡成果最出色 (超過20%) ②。有些國家也以有創意的方式使用與推廣網際網路。埃及開始推動技術通路之社區中心，讓更多的個人、民間團體、小企業、低收入社區等在公共建築物與地方商會中接近網際網路。波羅的海的愛沙尼亞雖小，卻積極使其上網人口高於法國與義大利，而且，他們將網際網路作為學習的工具，而不是打電動玩具。印度則經由人造衛星與太陽能充電的電腦來使偏遠村落接觸資訊、教育與醫療服務③。或許，我們應該這麼說，數位鴻溝 (或，數位差距，digital divide) 中潛藏的更深問題還不是接近通路而已，而是使用的內容與品質。這關係着我們對這個全球化與新技術挑戰的認識。

與全球經濟形構互動的新技術力量是資訊技術範型。這個在70年代美國加州矽谷 (硅谷) 出現的資訊技術革命，包括了數位化的生物科技，並非單向地由

聯合國發展計劃出版的《1999年人類發展報告》提醒我們：「地理障礙可能已為傳播與通信所減低，但是新的障礙已經浮現，像普及全球的資訊網，允諾連結，卻寂靜地，幾乎難以察覺地，排除了其餘的人。」數位鴻溝潛藏的更深問題還不是接近通路而已，而是使用的內容與品質。

資訊科技催動了網絡社會崛起，不但顯示了組織網絡之重要性和勞動個體化的趨勢，也在轉化時間與空間。電子多媒體也正在把我們分化為「互動的」與「被互動的」兩種人口，前者能參與主動創新，後者則被動接受資訊。在歷史劇變之中，轉化的過程才是關鍵，歷史的結局仍未可知。

社會決定的，而是由技術本身所引發的。然而，它一旦成為系統，其內容則為發展的歷史脈絡所決定。1990年後令人矚目的新經濟的主要特徵，就在於資訊化、網絡化與全球化。70年代的技術革命已被當作資本主義模型轉化的積極力量，新科技之高生產力也伴隨產生了彈性化的工作與不穩定的生產關係。以及，資訊科技催動了網絡社會崛起。它不但顯示了組織網絡之重要性和勞動個體化的趨勢，將「發展」(development)重新定義為「資訊發展」(info-development)，也在轉化時間與空間。跨國資本快速巨幅移動，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正在轉化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電子多媒體也正在把我們分化為「互動的」與「被互動的」兩種人口，前者能參與主動創新，後者則被動接受資訊。在歷史劇變之中，流動空間並非簡單地消滅了地方空間：轉化的過程才是關鍵。例如，零售業承受電子商務龐大的衝擊，但是它並未消失，而是被迫轉化交換與消費的形式。譬如書店就是最值得觀察的對象。當亞馬遜(Amazon.com)這樣的網上虛擬書店崛起，在城市裏群聚的既有書店街衰退了，有些有文化記憶意義的書店會被指定為城市歷史的地標(像舊金山的城市之光書店[City Lights Bookstore])，避免被破壞。然而，有些表現出特殊的空間與文化風味的新實體書店，也竟然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新脈絡中，有機會成為改變城市中心空間氛圍之重要元素，設計師的象徵操弄可以在都市設計與建築設計上獲得了全新的表演舞台。甚至，書籍生產在試探電子書或是現訂現印的速成書的市場可能性之時，另一方面，書籍本身的文化形式竟也有可能被設計得更細緻，升級為仿手工的產品，甚至在翻頁時都能撩撥閱讀者之身體與所有感官。總之，我們面對的由網際網路所縮影的新經濟是一個競爭的社會政治過程。有些社會行動者們逐利，更加緊盯貨幣起伏的價值；有些卻更信賴對原初團體的認同，並藉以挖掘抵抗的戰壕。貪婪的投機與狂飆的抵抗讓賭徒與暴民成為同台演員，不勞而獲竟然明目張膽地成為政治經濟結合的戲碼。然而，積極而深沉的社會行動者必須了解正在轉化中的社會並且認識新技術的龐大力量。流動空間的草根化(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是歷史與技術的挑戰。歷史與社會裏從來就沒有宿命論者發言的空間。這個全球轉化的過程是最值得我們探索的環節，歷史的結局仍未可知。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亞太經濟在全球經濟與各區域發展消長的趨勢中的變化。由1960年開始，尤其是1980年之後，東亞整體區域的收入成長驚人，當然，還得包括1997-98年亞洲經濟危機突然爆發，以及之後的辛苦復蘇。這種歷史性的不尋常經濟表現，技術升級強力跳躍所造成的脫胎換骨動力與機會，亞太，作為新的全球製造中心正在崛起。這種新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的轉化，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分化與多樣化，使傳統區域與國家間分類的南北對抗失去了分析現實的意義。這趨勢也改變了全球資本與華人資本的投資走向，徹底地改變了東亞，以至於世界華人社會的相互關係。然而，若進一步考察世界市場中的亞洲貿易模式與越界生產，我們就會看到日本與其餘亞洲國家間戰後長期的商

業與技術之雙重依賴性。亞洲其餘國家由全球經濟中，特別是由與美國間所獲的出口貿易剩餘，來承擔對日的入超，這種區域的依賴關係並未因亞洲的經濟成長而改變。換句話說，亞太，甚至亞洲，作為一個有經濟自主性的區域，至今並不存在。我們只有一個為全球經濟貫穿，在國際分工中有製造業活力的、快速發展的亞洲。亞洲經濟危機則是更進一步將亞洲納入全球經濟之中。當然，中國與印度未來的發展將有利於增加亞洲貿易本身的多重性。目前，前述的新經濟與新技術正是深化技術依賴的核心。大部分的東亞經濟體，國家與企業，或有前有後，均不得不傾全力於技術升級，尤其是資訊技術，提高生產力，試圖拉近與美日間技術依賴的差距。於是技術創新的能力將決定我們在下個世紀之命運，這又相當關係着我們如何能創造性地使用資訊與傳播技術，將全球接合地方。也在同時，作為新國際分工中的製造業基地，在東亞這種快速經濟發展所造就的「創造性破壞」的灰燼裏，伴隨着階級的兩極分化、環境意識抬頭、地域意識復興與性別關係改變，新的社會動力浮現。過去冷戰時期的敵對關係也演變成更複雜的全球化下政經文化糾結關係。華人社會，包括近代歷史地散居天下的僑社 (Chinese Diaspora, 或overseas Chinese)，都被迫必須用新的範疇來面對不可測的未來，必須思考華人社會與區域在全球經濟中的經濟活動、文化特徵與政治轉變，甚至，想像可能的網絡社會所支持的特殊地景。同樣地，面對當前快速而多重向度的變遷和結構性的社會與歷史轉化，西方／東方、現代／傳統……的範疇已經失去分析現實的能力，我們需要知道歷史的時勢，因為歷史正在翻頁。我們需要有歷史感，因為除了我們的歷史感之外，別無歷史感。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正是這個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崛起後的第一次警訊，我們可以預期一個開放的亞洲，但也卻是一個更脆弱的、更多衝突的世界。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改變了戰後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這原是亞洲華人政治與社會自覺與不自覺模仿的對象與參考的坐標。我們已經見到了既有的國家制度性角色的改變。浮現於30年代頑強的勞工運動壓力中的福利國家已被放棄。當福利國家讓位，公共空間私人化之後，相對地，作為歐美布爾喬亞社會的同一時代制度上一體兩面的對立體，市民社會的自主性竟亦被侵蝕。當福利國家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破壞，我們見到了社會騷亂與認同運動的烽火。前面提到的資訊技術範型，以及社會運動認同力量的拉扯，構成了新社會浮現的基本張力。可是，這種社區共同體的抵抗已不同於前個世代所相信的現代市民認同。社會運動仍在，然而我們看見運動的片斷化、地方化、單一議題、退縮於內在世界之中，或短暫發飆、糾纏在認同政治的內在情結之中……。這時，更需要對運動之分析而非教條認同。以此為基礎，計劃性的認同 (project identity) 才有機會提昇抵抗性認同 (resistance identity)，重新建構社會轉化所繫的主體性。歷史感無分進步與退步，在天堂與地獄之間，我們只有勇敢面對這個社會結構。我們看見歷史的尷尬，自由主義者取得的民主

作為新國際分工中的製造業基地，在東亞這種快速經濟發展所造就的「創造性破壞」的灰燼裏，伴隨着階級的兩極分化、環境意識抬頭、地域意識復興與性別關係改變，新的社會動力浮現。華人社會必須思考在全球經濟中的經濟活動、文化特徵與政治轉變，甚至，想像可能的網絡社會所支持的特殊地景。

制度竟然使人充滿了失落感。國家主權與議會代表制度雙雙動搖。前者終為全球經濟所貫穿，而議會代表制所表現的間接民主制度已為大眾媒體所表現的象徵政治所扭曲，擴大了形式民主的內在弊病。當票選總統如同進入超級市場選購商品一般時，有些人以為終於可以選擇自己的總統了，但是，真實的決策卻比過往更加隱而不顯，暗自在更遙遠的精英手上進行。對經歷了漫漫長夜的第三世界的自由主義者言，這黎明的情景更是情何以堪。在資訊流動中的後現代符號政治，嘲諷地對他們扮了一個歷史的鬼臉。

當民族國家(國族國家)在資訊化資本主義之全球化過程中歷史地轉化，國家仍然存在，然而，國家的新形式與社會的新形式也得重新開始摸索。一方面，在全球經濟與科技競爭的壓力之下，在城市國家(city-state)與市民社會的歷史土壤之上，歐洲分享了統一的經濟體，跨過了歐洲原先民族國家(國族國家)既有的固定疆界，卻並未產生有民族國家(國族國家)意義的、完全的歐洲國家，它們有意避免複製世界上已有的聯邦國家的國家中心與中央政府權力。於是，浮現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之制度，而文化上的歐洲認同，被期望成為聯繫政治與經濟建構正當性之計劃。另一方面，當區域經濟越發全球化，當鉅型城市連接了全球經濟，扣接了資訊網絡，集中了世界的權力，但是鉅型城市卻承擔着不均等發展的空間結果，它是空間的片斷(fragments)，也是功能與社會的碎片與區段(segments)所形成的不連續體。這也就是說，在進入網絡社會時，是甚麼人進入迴路，有權力描繪地圖？面對全球化與推動它的新技術，確實需要更開闊的治理體系(broaden governance)，而不只限於過去政府(government)角色。因此，摸索領域治理體系(territorial governance)重構之政治新視野，既需能結合區域發展與有自主性的社會活力(包括企業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又要能調和既有的各國中央政府應變遲鈍與諸多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缺失。今日，當亞太區域的發展性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歷史性的組織角色已逐漸釋盡其功能，而面對新世界形勢的快速變化造成的國家競爭力降低與民族國家(國族國家)角色弱化，如何能放手讓區域與地方政府面對新的結構性角色的挑戰呢？地方的治理體系(local governance)要如何才會夠敏感，回應全球化與資訊化過程中已經初步自我授權(或者說，培力)了的(empowered)草根人民的需要呢？舉例而言，阿姆斯特丹的數位城市(De Digitale Stad, The Digital City)計劃得到70年代違建運動的無政府主義者積極份子的推動，市府支持，未商業化，卻提昇了民主政治的草根參與與市民自主性。再例如，加州矽谷(硅谷)區域與新竹—台北區域間資訊、技術、資金、人才流動的網絡是思考全球資訊化過程有利的技術學習起點^④。甚至，已經全球化了的台灣，其企業競爭力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就正是來自這個加州矽谷—台北新竹—中國大陸沿海全球鉅型城市(global megacities)間之連結性，即，電子工業之國際化生產網絡^⑤。然而，國家與社會的新關係卻要如何調適呢？立足在東亞都市史的遺產之上，近年東亞國際貿易發展，似乎開拓了城市國家的物質基礎，但是，我們有無智慧與視野，大步跨

在資訊化資本主義之全球化過程中，國家仍然存在，然而，也得重新開始摸索國家與社會的新形式。面對全球化與推動它的新技術，確實需要更開闊的治理體系。而摸索領域治理體系重構之政治新視野，既需結合區域發展與有自主性的社會活力，又要能調和既有的各國中央政府應變遲鈍與諸多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缺失。然而，國家與社會的新關係卻要如何調適呢？

越亞太區域糾結着的大戰與內戰的傷痛，與國際地緣政治的歷史陰影，想像網絡國家的潛力呢？對全球經濟中的技術競爭言，企業與國家的組織角色重要，國家則尤為關鍵。古代中國技術優勢喪失活力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缺少彈性的政體的保守官僚。儒家的獨佔性政治倫理、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和皇權的一統性，對比於歐洲之自主性地域、彼此共享的文化與相互競爭，使我們由明代起即逐漸失去了技術的優勢。在過去的歐洲，不但歷史地形成了經濟與技術發展的動力，而且成就了現代科學，並建構了在今日已飽受質疑的所謂社會理性認知的能力。由世界史角度被迫對比之餘，我們誠然技不如人。經歷了數百年之遲滯，由改革到革命，由變法圖強到激烈的社會轉化，今天，我們好不容易有機會再度面對新的歷史轉折點，卻必須面對一個新技術要再度拋落我們的時刻。由毛筆書法寄情不朽，經歷鉛筆、鋼筆與原子／圓珠筆，到今天之電腦輸入，這不只是書寫工具之更新，更說明了網絡社會浮現：符號已經是生產力本身，心智與機器、象徵與技術也有重新互動的機會了。然此時，英語已經強勢地在作為世界工具語言的形勢下催逼人們拼命向前。我們沒有字母所造成的口語與語言間的斷裂，也因此，長期弱於概念性抽象思維，然而，當書寫、口語與視聽，在新科技力量有機會重新建構為一體的電子傳播方式中，以形象思維見長的中文傳統豈敢落後？有沒有另類的潛力？再進一步，這個全球經濟組織的基本單位已經變成網絡了，一個開放而多邊的網絡，而且是一個多重面向的虛擬的文化。面對全球經濟之多變幾何形式，華人社會政治領域之城際網絡 (intercity networking) 角色，在全球經濟競爭與資訊流動中，正在全球化的城市與區域將會是各地域未來的內縮自衛的戰鬥城堡呢？還是全球化與流動化過程中來往傳送資訊的虛擬橋樑與節點呢？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畫家列賓 (I. E. Repin) 的《伏爾加鱈夫圖》表現出對窮苦農民的深情，穿越時空，在為不均發展與數位

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畫家列賓的《伏爾加鱈夫》(下圖)表現出對窮苦農民的深情，仍然容易引起我們的共鳴。在新全球經濟的金融市場中，資訊網絡不但左右了真實的經濟命運，還創造了一個更向錢看、更以錢滾錢、投機與賭博的世界。



華人社會如何插手塑造這個全球轉化的過程呢？我們只有開放自己，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新資訊，這是飽經戰亂與辛酸的近代華人趨吉避凶之道。或許這樣，因經濟發展而剛浮現的市民社會才有可能摸索新形式，才有機會催動新政治，而資訊化城市才有機會成為可居的城市，提早在東亞來臨。

鴻溝所困擾的現在，仍然容易引起我們的共鳴。華人社會集體記憶中的悲慘現實生活所衍生的憂患意識，與對「經世濟民」之學的渴望，在貧窮、壓迫與兵災之中很難感受到基督教文化預言千禧年的太平盛世、恍若來世般的虛幻宗教幸福感。尤其是，在新全球經濟的金融市場中，由資訊網絡中取得了自己生命的資本之流，不但左右了我們真實經濟的命運，而且，它們還創造了一個更向錢看的單一價值，一個更以錢滾錢、投機與賭博的世界。

畢竟，亞洲已經不是過去被世界理解的邊陲之地，華人社會也不僅止於被世界視為是兩極化區域中新富之碎片與區段，更不能被種族主義者之成見視為是天生賭徒之鄉。若我們不妄自菲薄，那麼，我們要如何插手塑造這個全球轉化的過程呢？歷史豈會終局？我們亟需開放的心胸與有智慧的新視野，在全球轉化的過程中賦予我們的社會與歷史、空間與時間以有想像力的新意義，而非自限於歷史的鎖鍊，或沉溺於任何類型基本教義的認同情緒。我們只有開放自己，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新資訊，這是飽經戰亂與辛酸的近代華人趨吉避凶之道。或許這樣，因經濟發展而剛浮現的市民社會才有可能摸索新形式，才有機會催動新政治，而資訊化城市 (informational city) 才有機會成為可居的城市 (livable city)，提早在東亞來臨。魚沉水底，鱒魚逆流而上，然而它需更懂得乘勢；鷹擊長空，鷺眼鳥瞰，為的是接合地面的具體細微動態，我們需要控制自己的命運，因此，我們需要認識全球系統中的這個已來臨的新社會。

註釋

① 本文把“network”譯為網絡，是考慮到譯名需兼顧資訊科學與社會科學中之雙重要求，以及新加坡、香港、大陸等地之使用。我們放棄目前台灣通用的「網路」譯法。我們懷疑早年台灣資訊科學翻譯此詞時對網絡的理解過於簡單，其實，就資訊技術之範型言，「經絡」之「絡」比「路網」與「線路」之「路」複雜，卻接合既有之文化土壤，容易了解，也傳神的多。因此，除了Internet，World Wide Web等專有詞使用既有譯名外，對network、net等均譯為「網絡」。

② 然而，就網際網路(互聯網)的重度使用者方面，新加坡的女性比例卻只佔34%，男性為66%，相差30%以上，比香港婦女(42%)、台灣婦女(38%)的落差都大。參考Net Value 2000年7月到8月底的調查資料。

③ 以上資料參考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3-64.

④ 參考安娜李·莎克西尼安對矽谷新移民企業家的研究。AnnaLee Saxenian,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San Francisco: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1999).

⑤ 夏鑄九：〈全球經濟中之跨界資本——台灣電子工業之生產網絡〉，《城市與設計》(台北)，2000。